

泥岩區農民的生活世界與環境識覺形構——以燕巢、田寮為例

韓菊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人的環境識覺形構，基本上脫離不了他的生活世界；因此，識覺研究應是以人作為一個主體，對內外環境的所感、所知及所為的意象因素的反應。本研究嘗試以燕巢、田寮地區的農民為主體，探究他們對泥岩區的環境識覺。因為泥岩容易被沖蝕，泥岩的土壤缺乏保水力，且 pH 值高，並不適合植物的生長，然而，為何仍有人願意付出較高的成本在貧瘠的泥岩土地上墾耕？本研究藉由胡塞爾現象學的「生活世界」理論、海德格存在主義之詮釋現象學，用人和語言之間的探問關係作為理解環境識覺形構的媒介；以交談分析法具體操作，進行語言文本的拆解與再整合分析。本研究把農民的生活世界劃分為物質世界、可塑世界與感官世界。農民的物質世界可謂：「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其可塑世界只能「盡人事、聽天命」的去適應；而其感官世界則由生活中的感官經驗意涵所編織而成。本研究透過揭示農民生活世界的主題，形構出農民的環境識覺內涵。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特定水土保持區的劃定，使泥岩區的土地利用深受政策法令的約束；但是農民更深層的土地感是讓農民世代必須繼續墾耕於此的基礎。由此基礎，可形構出農民對泥岩區不同層次的環境識覺內涵。

關鍵詞：環境識覺、農民、泥岩區、現象學、生活世界

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from the Farmers' Life-World in the Mudstone Area—A Case Study of Yenchao and Tienliao, Taiwan

Jiu-Mei Han^{*}

^{*} Ph. 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of human being is basically formed by his life-world. Therefore, the study of human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 should emphasize the subjectivity, i.e., human responses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age factors of environment, including sense of feeling,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s. This study tends to explore farmers' perception of mudstone environment based on a presumption that the farmers at Yenchao and Tienliao are deemed as the subjectivity. The question has often been asked: why are people willing to fight to survive in the hostile mudstone country despite that the mudstone is susceptible to soil erosion and unsuitable to croplands with low water retention capacity and high pH? Adopting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theory of "life-world" and Heidegger's hermeneutical phenomenology of existentialism, this paper attempted to construct human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by inqui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ir language. The study carried out the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of language text by dismantling and re-integrating the text. This study divides the farmers' life-world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the physical world, the adaptive world and the sensible world. The physical world provides the farmers with little resources and puts many constraints on the life-world. The farmers' life-world in the mudstone country is situated in an

unfavorable environment which is lack of opportunity and bureaucratic support. In the adaptive world, the farmers can barely rely upon themselves to transform barren lands into farmlands by improving soils and digging ponds and basins. While the sensible world is weaved by the farmer's cognition of sensible experience on their lif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armer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was constructed by the subjects of their life-world disclosed by this study. Furthermore, laws and regulations impose restrictions on the utilization of mudstone area due the need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e found the farmers' deeper sense of the land is, however, the basis for continuing cultivation in this barren land for generations. These situations constructed the farmer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of the mudstone country in different hierarchy.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Farmer, Mudstone, Life-world ,
Phenomenology

壹、前言

環境識覺研究是地理學人地傳統探討的主題之一，人類有屬於他自己的環境，且以此方式將知識儲存和組織在其心中，即他們關心真實世界的「意象」(Downs, 1970)。意象的基礎包含客觀可見及想像虛擬的部分，因此，對屬於不同意象世界的個體而言，即使處在相同的物理環境中也可能意識到相當不同的東西。Gold (1980) 認為意象源於每日和環境接觸的結果，是環境與人之間的產物。Ingold (2000) 曾以社會及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論證狩獵—採集者識覺環境的方法，強調他們自始便沉浸在與其自身所處的世界之組成要素上，以一種行動的、實踐的和知覺的方式和世界契合。這種「設身處地」的本體論，能提供我們一種較好的方式來掌握住人類存在的本質。相較於西方心智與世界分離的本體論，這是另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且充滿現象學的色彩。

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是現象學的創建者，他在《歐洲科學危機和超越現象學》一書中指出，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概念」，因為，實證主義只研究客觀事實是對科學任務的限制，其看不到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統一關係，看不到客體的意義是由主體授與的，看不到客觀的事實是依賴由主體所建立的理論 (Husserl, 1992)。據此，環境識覺研究不能脫離主體性 (subjectivity) 的問題，即主體以自身意識為出發點認識、把握、理解客體或內省自身的特定視角的問題 (吳豐維, 2007)。特定視角其實就是胡塞爾所謂的「視域」(horizon) 概念，就是區別「客體化世界」與「生活世界」的關鍵 (魏光莒, 2006)。在不同「生活世界」裡，會有不同的理解態度、理解方式及產生出不同的認知結果。因此，如何生活隱含如何識覺，如何識覺又脫離不了生活世界中特定的時空脈絡。換言之，這個世界的真實向度不是作為一個被客觀化的實體，而是作為理解一切事物的特定視角，每個人識覺的主體性由此而生。

誠如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生活世界」理論，主張生活世界是一個“非課題性的、奠基性的、直觀的、主觀的世界” (倪梁康, 2005)。「非課題性的世界」意指將現實世界的存在看作是一個毋庸置疑、不言自明的前提；「奠基性的世界」意指所有對生活世界的探討都必須以生活世界本身為前提；「直觀的世界」意指日常的、伸手可及

的、直觀地被經驗的世界；「主觀的世界」意指生活世界的真理是相對於每個個體而言的真理，它隨個體自我主觀視域的運動而發生變化。據此，就環境識覺研究而言，「生活世界」看似無所作爲，其實正是一切識覺的源頭。

此外，對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¹而言，現象學帶領我們到一種新的觀看方式，而不是一組哲學命題 (Moran, 2005)。海德格專注於生活經驗之存在結構的揭露，生活意味著「存有」(Being) 以多樣的方式和世界發生關聯，存在 (Sein) 就是「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不過，這個「世界」並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說的客觀的外在世界，而是指「我」在其中生活、與我發生關係又隨時可能爲我所用的一切事物 (高宣揚，1993)。因此，在海德格存在主義中沒有脫離人類存有的「世界」，但這不意味著物質世界的存在取決於感知它的心靈，而是人類將各種現象組織成爲某個統一體或「世界」(Peet, 1998)。海德格進一步認爲「存在於世」就是存在於「言說」之中，言說使人與人之間的「共在世界」(with-world) 得以開展 (李燕蕙，2005)，在詮釋及言說中所表達出來的就是意義。對海德格來說，我們實際與事物交會的性質被包含在我們對語言的使用之中。

綜觀胡塞爾和海德格的現象論體系，對於環境識覺研究的啓發在於胡塞爾的「意識」、「意向性」觀點，其實和環境識覺研究的前提是不謀而合的。因爲，識覺研究者深信每個人都有一幅世界的「意象」，準此，「意象」與「意識」的概念找到了交集，他們均是個人由「內在」通達「外在」事物的指導中樞。至於海德格的「存有本體論」，將胡塞爾的意識研究進一步落實於實踐性的生活動，這意謂「認識」須從與日常生活世界打交道出發，而環境識覺研究本強調識覺的形成是整體生活境遇的結果呈現 (Sonnenfeld, 1968; Saarinen, 1974; Rodaway, 1994; Amedeo, 2004)。因此，本文將採現象學理論與方法之研究路徑，對主體自身環境識覺的經驗領域以言說的方式形構出來。現象學的科學性在於讓現實自身說話，此意謂雖然在環境識覺研究中，實證量化是主流的形式 (韓菊美等，2011)，但現象學理論與方法應可更貼近主體於環境識覺中意向性的呈現。

具體言之，本研究聚焦於泥岩區農民的生活世界與環境識覺形構，緣於台灣西

¹ 海德格在弗萊堡 (Freiburg) 大學時向胡塞爾學習。

南部泥岩區容易被沖蝕，使流經其中的二仁溪及曾文溪年平均產砂量居世界第一、二位（李德河等，2002；張文章、阮亞興，2003；董金進、阮亞興，2003；陳盟文，2006）。考諸過去泥岩區的相關研究，主要屬於自然科學的領域，諸如泥岩之基本物性、邊坡沖蝕特性、地形發育過程或透過泥岩構成的地質紀錄導出古氣候條件等研究（Aplin, et al., 1999; Hobbs, et al., 2002; Taylor, 2003; Schieber, et al., 2007）。自然科學的泥岩區研究，由於學科屬性的定位，因此不會觸及「人文」的領域，而臺灣學界亦復如此²。雖然，鐘寶珍（1991）曾觸及泥岩惡地上的人地關係，即透過歷史脈絡，詮釋田寮鄉特殊生態環境對於人文發展的巨大影響，但其內容所述之經濟生活限制、血緣聚落的共同體社會、小範圍的通婚圈及超村落的祭祀圈，可說是相當一般化的結果。因為，這些現象在非泥岩惡地區的早期聚落中亦可發現（許淑娟，1991；葉宛錡，2001；韓菊美、宋國城，2003）。此外，張毓棻（2008）曾透過日本時期戶口調查簿所提供的的第一手資料，瞭解燕巢地區在日本時期的人口結構與經濟活動面貌。由此可知，泥岩惡地區的研究，尚缺乏以當地居民為主體的觀點，換言之，地理學在泥岩區中人地關係的探討，仍有極大的發揮空間及待了解的問題。據此，本研究目的有三：

1. 建構環境識覺研究的知識論基礎與方法論根基。
2. 建構泥岩區農民的生活世界。
3. 揭示泥岩區農民環境識覺的意義內涵及其形構。

貳、環境識覺研究的知識論基礎與方法論根基

在傳統哲學的探問中，知識論就是探討人如何去認識、認識的能力與認識的對象（鄔昆如，1990）。地理學的核心知識之一是闡明人地關係，對人自己 and 人所處環境的問題做探究與反思，而這正是哲學的內涵。以下將透過哲學與地理學的交相呼

² 筆者曾於 2011 年 1 月在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輸入關鍵字「泥岩」進行檢索獲得 668 筆資料，逐一過濾檢查發現屬於地理學領域的泥岩區研究僅 8 筆（任家弘，1994；吳唐竹，2004；陳力，2005；林慧宜，2006；聶英潔，2006；楊智傑，2008；鐘寶珍，1991；張毓棻，2008），其中前 6 筆屬於自然地理學的研究；後 2 筆則屬於人文地理學的研究。

應，作為進一步架構環境識覺研究的方法論根基。

一、環境識覺研究知識論之思考脈絡

環境識覺研究是行為地理學的重要內涵，行為地理學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方式，一是致力於經驗驗證、重視科學測度的實證取向；二是仰賴描述、深入同感，去發掘不同環境與身處其中之個體意義的人文取徑（倪進誠，2004）。在人文研究取徑中，人文主義、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等觀念，是以積極的態度去深入探索人類行為，這些偏重質性研究的論點，企圖從更開放的視野來對人類行為重新看待。本文提出環境識覺研究知識論之思考脈絡如圖1所示，說明如下：

環境識覺研究淵源於狹義的行為地理學，若林芳樹（1985）指出狹義的行為地理學是指基於實證主義行為論方法的研究。然而，在歷經數十年的變化後，一些研究已將空間視為被個人賦予意義的有機體，因此，廣義的行為地理學研究的空間，成為帶有人文主義的特點。人文主義的知識路徑強調人的主體性事實，將人作為地理研究的出發點，改變人作為空間奴隸的地位（于濤方、顧朝林，2000），且儘可能地減少先決條件，其目標是認識人類活動的真實性質。Ley（1982）認為一個沒有人的地理學，在知識上是不完善的，在理論上也是盲目的，「人文主義地理學」正面探討了人地關係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此外，人文主義地理學者將胡塞爾的現象學哲學引入人文地理學的研究中，以期用現象學方法來取代實證主義方法（Gregory, 1978; Hay, 1979; Peet, 1998），這使得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發展有了比較牢固的基礎，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現象學方法認為不存在一個單一、客觀的世界，更不認為這個世界可透過“假設—檢驗”模式來認知。胡塞爾提倡回到事物本身，以人的「意識」為起點（Husserl, 1992），由意識透過意向，從心靈直透到感官世界的表層，以尋獲現象背後的本質，重返「生活世界」。現象學在地理學的應用，說明胡塞爾現象學的「生活世界」理論，是作為經驗科學的地理學的基礎（池永歆，2007）。現象學另一重要學者，胡塞爾的學生海德格進一步將胡塞爾的意識研究落實於生活經驗之「存在」結構的揭露，他認為我們的生存狀態會決定我們的解讀方式。存在主義在地理學的應用，說

明海德格「在世存有」的空間思想，他認為人和世界的關係是一種「存在地參與其中」的關係（李天命，1976）。

人文主義地理學匯歸了胡塞爾的「現象學」和海德格的「存在主義」。潘朝陽（2005）認為「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兩支現代西方哲學的流脈本是源流同一，因此，以此兩支哲學為方法論之「現象學地理學」和「存在主義地理學」，實可匯合通融為「存在現象學地理學」。至於「詮釋現象學地理學」此一研究取向之空間理念強調由「主體性空間」所建構的「存在空間」，即通過「在世存有」的「世界」實踐性活動，詮釋主體建構的生活世界，也就是「此在的詮釋（interpretation of Dasein）」（潘朝陽，1991；潘朝陽，2001）。現象學致力於尋求現象本質的了解，但若精確體會本質的意義，則需透過詮釋學形成的結構與意義來理解。

綜合上述環境識覺研究知識論之思考脈絡可知，從人文主義地理學的路徑探討環境識覺研究，理應回歸人的主體性研究，否則無從理解識覺內涵的本質。在世存有的人類，在時間的有限性當中，透過各種切身的體驗後，必須按照自己的處境做選擇。因此，人類並非某種既定普遍人性的具體化，相反地，充滿了許多獨特性與多元性，此豐富內涵的展現，正是環境識覺研究之價值所在。

二、環境識覺研究之方法論與研究架構

環境識覺研究主要的問題在於其方法論的性質，因為要準確表達自我感知及感知與行為的聯繫是有困難的，這些困難點根源於人的內在情感結構本難以精確掌握。施添福（1980）指出識覺、價值及態度本身的性質極為隱晦，它和實際環境行為之間的關係也變幻莫測、難於掌握。倪進誠（2004）亦指出過去人地關係的研究多採實證問卷或直接觀察，這些方式已被質疑。實證量化雖可藉減低人的複雜性而得到某一特徵人群會有什麼樣的行為，但爭議的是在此研究過程中所得到的結果，和事實間已產生相當大的差距（Bunting & Guelke, 1979）。量化研究化約的方式可能也將個人重要的體驗過濾掉了，據此，值得探究的是用什麼方法最適合逼近（approach）識覺研究的真實樣貌？

就環境識覺研究而言，現象學貼近主體意識的方法，應可彌補量化研究過度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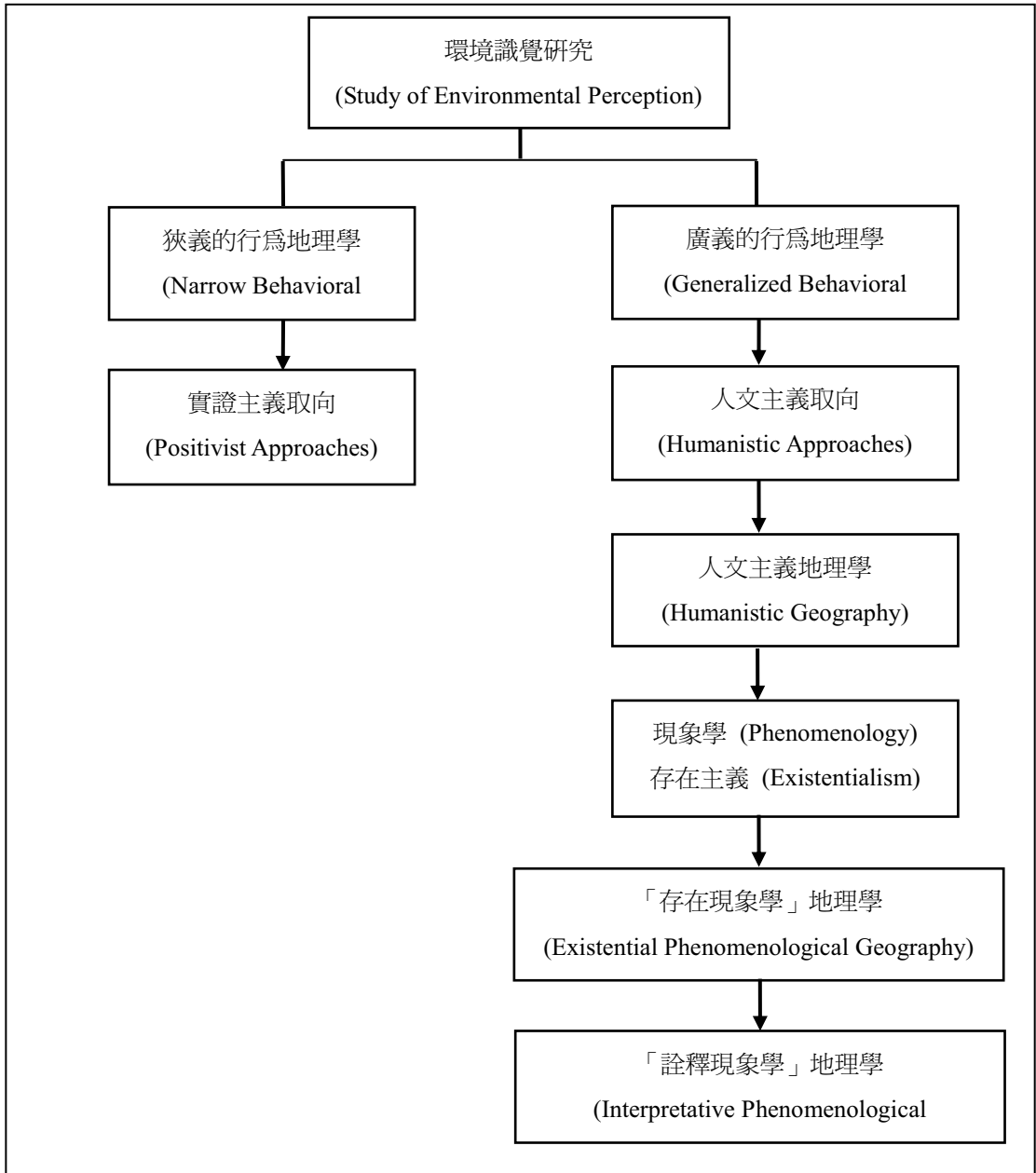


圖 1 環境識覺研究知識論之思考脈絡圖

約的模式。然而，應用現象學觀點於環境識覺研究在國內相關研究中尚不成熟，甚至仍有許多待討論的空間，諸如：現象學思想的理解並非容易（鄧曉芒，2008）；現象學方法的具體操作仍無固定模式（von Eckartsberg, 1998）；自然科學訓練的慣性思考使我們很難面對感覺、知覺流變的本質等問題（韓菊美等，2011）。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對現象學體系的理解，提出一套在環境識覺研究中可具體操作的方法。所謂具體操作的方法，在於以胡塞爾「生活世界」理論為基礎、海德格存在主義之詮釋現象學的主張，用人和語言之間的探問關係作為理解識覺的媒介。

「生活世界」理論是胡塞爾後期著作中特別重視的課題，對他來說，生活世界是一個科學批判的概念（Husserl, 1999a），它隨個體主觀視域的運動而發生變化，因此，回到「生活世界」便是回到客觀化與理念化之前的經驗（Husserl, 1999b）。人怎麼生活隱含人怎麼看世界，並由此建構出我們自己的世界觀。胡塞爾現象學觀點的具體落實則和詮釋學有關，海德格強調詮釋是讓「存有顯露」（汪文聖，2001）。事實上，生存本身就是一連串的詮釋過程，Palmer (1992) 認為詮釋具有無處不在性，誠如我們整天的日常生活也都在「詮釋」。因此，海德格認為「理解」和「詮釋」都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模式（Heidegger, 1990）。海德格認為理解人的存在不單靠純粹描述，更需詮釋的過程來理解（高淑清，2001）。海德格透過「語言」探究存在，以「語言」為中介，作為進一步釐清「意識」的方法。他認為「存在於世」就是存在於「言說」之中，所以，語言的理解就是存有層面的理解，語言可將存有的原始經驗顯露出來。

透過上述環境識覺研究的知識論基礎與方法論根基，本研究聚焦於台灣西南部燕巢、田寮泥岩區農民的环境識覺形構與內涵，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分為三大部份，詳述如下：

（一）「大地的存有」：農民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指人們具體經驗到的周遭世界（魏光莒，2006）。農民「靠天吃飯」，依賴自然條件過日子，是人地關係互動最密切者。因此，本部份希冀能透過農民在泥岩區的生活經驗，理解環境識覺研究中人地互動所產生的「感官世界」、「可

塑世界」與「物質世界」。所謂「感官世界」意指透過農民的「視域」所理解的世界；所謂「可塑世界」意指農民在實踐生活動時，必須採取一些相應的手段，進而形成可塑世界；所謂物質世界，意指在農民的生存空間中可提供的自然物質條件與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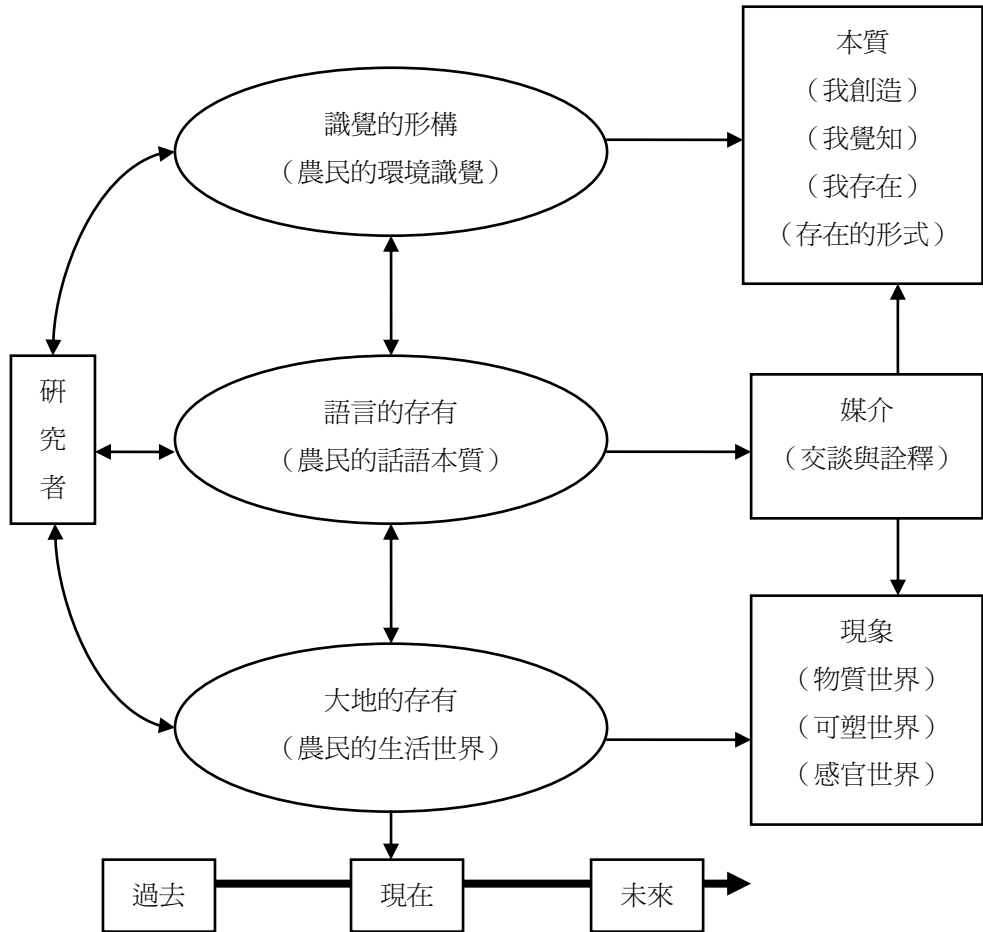


圖 2 研究架構圖

(二)「語言的存有」：農民的話語本質

語言與思考是兩個緊密相關的活動，概念之間的連結甚至概念的存在，都直接

與人類語言有關 (Droit, 2007)。語言也持續不斷地將人們和山川物象的互動，記下註腳。因此，語言是我們了解世界的符號系統，符號系統產生出一種有機的意義關連，而成為有血有肉的存在 (Crystal, 2001)。既然語言是說話人的標記，則透過深度訪談的文本 (text) 將是一種自為的「存在」，它可產生自己的力量和動力。故本研究必須處理「農民的話語本質」，透過「交談分析」與「詮釋分析」等步驟，希冀能展現出農民的生活世界，進而理解農民的環境識覺。

(三)「識覺的形構」：農民的環境識覺

識覺的領域實質上承接了與個人經驗世界具體的、有意識的關係。因此，在理解農民的生活世界之後，尚需把外在世界存在的模式拉進主觀意識的辯證發展中。即在既有的世界裡，不同的主觀認知應該被認真面對並探討它的意義，進而發現「我存在、我覺知、我創造」等存在的形式本質。至於研究架構下方的「過去、現在、未來」，說明時間的無所不在，這個世界是由時間串起的一系列事件，時間是人、事與物存在的過程，時間紀錄一切的變化，而我們的生活世界正處於此一時空脈絡之中。

參、環境識覺研究的具體操作過程

Seamon (2000) 認為「理想的現象學方法是接近現象如一個初學者」。換言之，研究者並非以專家之姿接近現象，而是如初學者般不帶任何成見地進入被研究者自身的生活世界。現象學者對於他將發現什麼或被發現的事物將如何繼續進行並沒有清楚的意識，因此，從事現象學方法的質性訪談時，研究者必須使他的方法適應現象的本質和境遇。

本研究採「非隨機抽樣」設計的方式進行深度訪談，包含「滾雪球抽樣、偶遇抽樣及立意抽樣」等方式，訪談時間從99年8月到100年3月。抽樣方式與受訪者基本資料如表1所示。

個案	抽樣方式	性別	年次	教育程度	居住地	訪談日期/時數
1 阿晉	立意	男	62	國中	金山里	99.8.16/99.9.2/共 4.5hr
2 阿惠	偶遇	女	52	高職	南燕里	99.8.16/100.1.20/100.1.21/共 7.5hr
3 全哥	滾雪球	男	35	小學	角宿里	100.1.21/共 1hr
4 晉母	滾雪球	女	41	小學	金山里	99.8.18/共 1.5hr
5 陳老	立意	男	24	不識字	田寮里	99.9.2/99.9.11/共同訪談計 4.5hr
6 陳妻		女	26	不識字		
7 陳女		女	49	小學		
8 阿厝	偶遇	男	39	國中	東燕里	100.1.21/共 1hr
9 阿雄	立意	男	53	國中	深水里	100.2.9/100.2.10/100.2.11/共 7hr
10 陸老	偶遇	男	20	不識字	金山里	100.2.11/共同訪談計 1hr
11 陸妻		女	23	不識字		
12 雄妻	滾雪球	女	55	國中	深水里	100.2.11/共 1hr
13 阿哲	立意	男	50	小學	金山里	100.3.5/共 1.5hr
14 鄉長	滾雪球	男	46	大學	安招里	100.2.13/共 2hr

表 1 抽樣方式與受訪者基本資料

綜觀表 1，受訪者共 14 位，研究對象的人數是基於資料飽和程度而定；性別方面，男女比例相近；年齡方面，從 39 歲到 81 歲之間，每隔 10 年的年齡層分布均勻，有助於理解不同世代的農民之環境識覺內涵；學歷從不識字到大學均含括，有助於理解教育程度對日常生活識覺的影響。

訪談方式包含「非結構式的訪談」及「半結構式的訪談」，兩者交互運用，企圖直接、開放地與受訪者自然、個別地互動，用以收集受訪者日常生活世界的環境識覺資料。「非結構式的訪談」沒有提出問題的標準程序，只給一個題目，如「你們如何稱呼燕巢（或田寮）的特殊地形？」由此展開訪談的方向，訪談者與受訪者可以自由隨意地談出自己的意見與感受（袁方編，2002）。但為了避免交談時流於過度漫

談，本研究亦採「半結構式的訪談」，即提問的結構雖然鬆散，但仍有重點和焦點，聚焦於農民對泥岩區自然環境的認知、情意、求生存的技能與生活經驗等主題。但所提問題亦可邊談邊形成，且提問方式和順序可依受訪者的回答隨時提出，相當有彈性 (Rubin & Babbie, 2000)。此外，在訪談過程中均事先徵得受訪者的同意進行錄音，以利後續訪談逐字稿的謄寫。

一、訪談逐字稿的建立

將訪談錄音資料轉譯成完整詳細的書面記錄後，才著手進行資料的分析。由於以現象學方法進行深度訪談，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必要時需重複性接觸 (encounters) (Taylor & Bogdan, 1984)，因此，錄音結果內容十分龐雜、鬆散，轉換成逐字稿的頁數亦多。如表2所示，共258頁、15萬5千餘字。

表 2 訪談逐字稿頁數與字數

個案	逐字稿頁數	逐字稿字數	個案	逐字稿頁數	逐字稿字數
1 阿晉	43 頁	27495 字	9 阿雄	74 頁	44875 字
2 阿惠	42 頁	28801 字	10 陸老	12 頁	5187 字
3 全哥	7 頁	3549 字	11 陸妻		
4 晉母	18 頁	8925 字	12 雄妻	14 頁	7842 字
5 陳老	32 頁	19861 字	13 阿哲	5 頁	3372 字
6 陳妻			14 鄉長	8 頁	4471 字
7 陳女			合計	258 頁	155421 字
8 阿厝	3 頁	1043 字			

1. 訪談逐字稿的分析步驟

以訪談逐字稿的語言為文本時，面對龐大的資料，可藉助「交談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詳細的操作流程對談話行動進行認識 (Nofsinger, 1991；引自

李維倫，2004)。具體分析步驟說明如下：

- (1) **標記語句**：由於逐字稿的語言概念是鬆散的，所以必須仔細閱讀數遍，並將重要概念標記語句，此動作類似我們閱讀時會以底線畫重點一樣。
- (2) **區分意義單元**：將文本資料進行「意義單元」的區分，將所有描述的資料形構成種種意義單元的部分（蔡錚雲，2006）。如此做的重點，不在於方便檢驗它，而是回頭重讀資料，以便將意義單元串連起來。Giorgi (1997) 認為這是現象學方法獨特之處，因為，一般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先設立一些判準，再從實際的資料中找尋相應的事實，但現象學的研究方法卻在發掘 (discovery)，從資料中發掘意義。
- (3) **構成主題**：由於文本資料是以日常生活觀點來陳述，故研究者須把他們的陳述翻譯到專業術語之中。「整併」的工作是把拆解開來的理解再扣回成一個完整的經驗結構描述，「構成主題」的形成並不完全受制於意義單元限定的意涵，反而是進一步進入「部分—整體」的運動之中，將「構成主題」綜合為研究者欲表達出的具體生活經驗的本質結構。
- (4) **整合論述**：整合論述是將之前非常細節的分析，經過多次的拆解與再整合，去構想他們之間的整體關聯，以發展出一個可理解的統合圖像來把握存在的可能樣態及識覺。

本研究根據上述分析步驟，將高達15萬5千餘字的訪談逐字稿，層層精煉成不同的主題，並將每一個個案的主題，找出共同的現象並整合論述之。

2. 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問題

在應用現象學分析時，事實上，其判準議題也不容忽視。就實證主義者最關心是否「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 的問題來思考，可用什麼準則來建立現象學方法的描述和解釋的可靠性 (reliability)？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可靠性這個議題首先涉及到解釋是否恰當的問題。Churchill (1998) 和他的同事曾試圖處理解釋相對性的議題，結果顯示現象學的解釋提供了某種程度的相同及差異，但這些差異並不表示現象學方法是失敗的，只是證明人類的解釋永遠只是「部分的」(Seamon, 2000)。即

現象學方法的解釋只是各種解釋的可能性，關鍵在於研究者是否能吸引讀者進入他的發現，讓讀者擺脫慣常的認知，沿著新途徑更深刻地去理解他人的世界。Polkinghorne (1983) 曾提出四個特性，以幫助讀者判斷現象學解釋的可信度：(1) 生動性 (vividness)，指吸引讀者產生現實感和信實的特性；(2) 準確性 (accuracy)，指讀者在他們的生活世界能認識到這種現象，或可以共鳴地想像這種情況；(3) 豐富性 (richness)，這涉及審美深度和描述品質，以使讀者可以帶著情感及知性進入解釋；(4) 簡潔 (elegance)，指得體的、有系統的描述，甚至以優雅或尖銳的方式披露現象。使用這四個標準，可以作為評估具體現象學分析工作的成效參考。

肆、農民的生活世界

根據上述研究方法與訪談逐字稿分析步驟，農民的日常生活世界透過基本的物質世界、可塑世界及感官世界等三方面來揭示，構成的主題論述如下：

一、物質世界：農民對水土資源的認知與變化

泥岩區的物質世界中，水土資源提供少許機會及諸多限制。燕巢、田寮泥岩區屬特定水土保持區，據此，形構成農民對水土資源的認知及法律制度的感受等環境意識內涵。

(一) 「水資源」的認知與變化：雨水、池水與井水

1. 依賴雨水與池水

泥岩缺乏保水力，因此農民依賴雨水。「我們烏山頂這邊靠天公伯，它下雨才有的吃，不下雨就完蛋了」(9 阿雄)，因此，挖池蓄水是必要的(照片 1)。「這邊儲水要有規劃，儲一點根本不夠用，儲多的話也沒有地方。鑿一個蓄水的要一、二分地，整年度下來它一樣會乾枯掉」(阿雄)。顯然，蓄積雨水的成本亦高，且未必能長久使用，必須不斷花錢維護，「坍了就還要怪手來做！一天六千元。有時還要挖水溝，做那個划不來啦」(5 陳老)。

四、五十年前在太陽谷挖池蓄水是可以的，「以前做埤仔是可以的！沒有在管什麼」(陳老)。即使一、二十年前亦可通融，「那池是我爸那個年代弄的，差不多一、二十年了，當時林務局也有意見啊！我爸叫立委去陳情，後來發文說無條件給我們使用，但不要再挖了」(1 阿晉)。據此可知，在一、二十年前動用怪手挖池蓄水，林務局雖有意見，但拜託民意代表似乎還有作用，現在則無效了！「林務局最近上班的比較不甩。以前不要說議員、立法委員，連鄉民代表都可以去說。現在連立委也不理。他們只是說我們依法辦理啊」(阿晉)。顯然人情關說已行不通，且水土保持的執行愈來愈徹底，「這四、五年來更嚴格，只要隨便挖一下，馬上就空拍。他們都有直升機出來巡邏」(阿晉)。農民認為在泥岩區生存愈來愈不易，除水資源缺乏外，亦不得開挖水池了。



照片 1 泥岩區挖池蓄水，灌溉果樹

(資料來源：2004 年野外考察)

2. 開鑿井水

燕巢區各里的地質與地下水位深淺變化十分不同，阿雄認為烏山頂這邊打不到井水，因為「沒人敢打、怕泥漿跑出來！很多鑿井師傅來看說這個很危險！如果鑿了，泥漿流到別人的土地怎麼辦？」這可不是賠錢與否的問題，而是萬一泥漿毀了別人的田地，農民認為根本賠不起。所以烏山頂這邊沒有井水也不易儲水，田地主要屬於看天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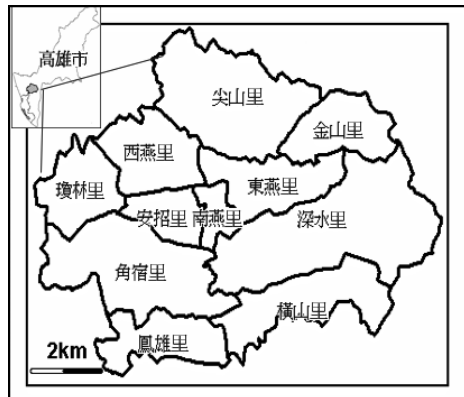


圖 3 燕巢區各里分布圖

井分為深井和淺井，區分方式是「看你挖的米數！像燕巢角宿里這邊差不多一百米左右就有水了，可是東燕里那邊要挖

到三、四百米」(2 阿惠)。深度不同，價錢就不同，「最近我們挖兩口井，加上馬達、電，挖一口井就要十四、五萬。像角宿里這邊可能五、六萬」(阿惠)。角宿里位於燕巢區的西南方，東燕里偏東北方(圖 3)，所以開挖水井的成本呈現愈往東北方丘陵地帶愈貴，但到了烏山頂泥火山附近(深水里)，由於泥岩地層的關係，農民則完全不敢開鑿水井。雖然挖井成本很高，但阿惠認為不得不挖，因為「不挖水井就得用別人的，要分配時間而且很貴！一小時要一百元！」阿惠家沒租過別人的水，「我們都自己弄，我爸習慣隨時要用就有！」阿惠家也不願出租水給別人用，因為「我們覺得很麻煩！」

綜合上述可知，水資源在田寮、燕巢地區十分珍貴。務農除雨水外，尚需鑿井灌溉，平原區開鑿成本不到丘陵區的一半，泥岩區則無法鑿井，深恐泥漿冒出毀了田地。雖然農民對地底泥漿深度的想像並不正確，因為「泥漿庫」深度至少在 200 公尺深處，這可從泥漿的溫度推估(宋國城、陳力，2006)。雖然農民的認知有誤，但對大自然心存敬畏且朝趨吉避凶的作法進行，應是農民最好的選擇。

(二) 「土地所有權」的認知與變化

農民對泥岩區「土地所有權」的認知可分為三類，「有的是祖先留下來的，有的是林務局的土地，一些是“埔育地”(台語)，就是山溝沖下來的，比較平就可以耕作」(阿晉)。

1. 關於祖先留下來的土地：若無登記變更則成為林務局的土地

泥岩區繼續務農的人，一般都是祖先有留下土地。然而，在日治時期必須繳納土地稅者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沒錢或不願納稅者則只能為承租戶。「以前的人沒錢繳稅金，用租的比較便宜，所以，租都租很大塊，自己有權狀的土地，都辦很小塊。日治時代土地要變更時，沒去辦理，土地就變林務局的，現在都跟林務局承租」(阿晉)。顯然早期的人沒有土地所有權及土地稅的相關概念，認為租的較划算，甚至將土地登記在別人名下，「像旗山有個憨厚的大地主，在日治時代很多人都怕繳稅金，就登記他的名字，最後土地都是他的」(阿晉)。

民國 97 年時，內政部曾補辦土地所有權變更手續，「但因為從公告到辦好差不多才三個月，補辦程序很複雜，日治時代的租單、產權單很難找。後來有找到，但來不及了！辦這個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阿晉)。顯然，政府與農民對於補辦土地變更程序所需時間的認知落差甚大，亦凸顯政府無法體恤農民多為知識程度低，對於重要資料管理能力較差的事實。況且年代久遠，的確不易找出原始資料，因此，阿晉十分扼腕，錯過變更期限，因而喪失部份祖先留下來的土地且變成林務局的。

2. 關於林務局的土地：管制十分嚴格

燕巢、田寮一帶屬阿公店水庫上游的水土保育區，管制十分嚴格。「土地翻耕都要申請，連私人土地也管制，現在怪手一進來，通報上去就罰六萬元」(阿晉)。農民對私人土地也被嚴格管制，心有不滿。畢竟務農時總需要怪手幫忙，但所謂管制就是一律不准，土地管制所造成的不便，在每隔 10 年換租約單時達到高峰，「像這邊有個人在小份尾有塊租地，以前摘龍眼、荔枝都在山寮包裝，政府已租給他們三、四十年了，現在新的專員叫他們一定要拆掉，不然不能換約」(阿晉)。農民振振有詞地列舉他認為林務局管制的不合理處，顯然農民和公務人員對於土地的認知完全不同，農民只想充分利用土地，但林務局專員只想依法行事，避免節外生枝。就農民的角度而言，大地就是他的辦公室，耕作當然需要配套的工寮設備，但是吹冷氣坐辦公室的公務人員，只從本位角度思考，因此無法看見不合理之處。林務局僅依法行事，不顧情理的做法，令農民積怨甚深。

農民被眾多的規定箝制，因此，希望爭取成為原墾農，「原墾農就是希望耕作的土地要合法，就是給租約單啦！或是放領啦！就是可以給我所有權狀」(阿晉)。農民爭取的其實就是一個保障，畢竟錢都投資下去了，萬一土地被收回，等於一切成空。不過，爭取原墾農之路充滿荊棘，「爭取原墾農已 20 年了，我爸有加入原墾會，後來我們三個兄弟也都加入，可是也爭取不到」(阿晉)。農民爭取成為原墾農是一條漫漫長路。

3. 關於埔育地：提供農民早期耕種的契機

當地人對山溝沖刷下來的土地稱“埔育地”，「這種土較“刻苦”(台語)，農民

因為沒有土地才種在這邊」(阿晉)。對農民而言，將荒地化為可耕地事關生存問題。然而隨時間的遞嬗，擴耕的面積也不斷的增加，土地所有權也面臨必須釐清的階段。誠如陳老生於 1935 年代，不識字，家中十個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當兵前從未做過工作，只有看牛而已。退伍後就在住家附近的太陽谷河谷開墾，栽種近五十年之久(照片 2)。他說以前這片土地「沒在管什麼！」直到 2006 年陳老的墾地被法院判決應歸還給林務局，且被判罰「四十萬元」，自此陳老的生活陷入惡性循環的處境中。個案 6 陳妻哀怨道：「我們種那塊地，錢都白白虧掉！我常懇求他們給我們原租，他們不要！做人不應該這樣，你不給人家做，為什麼不盡早阻止？」對一個不識字、七十幾歲的山中老太婆而言，以他們有限的常識，對土地被沒收的看法是政府為什麼不盡早阻止？待一輩子的心血都投資在這，老邁時才被沒收，此舉等於謀生的命脈被切斷！「可憐啊！我們不是沒有請求呢！只差沒跪下去」(陳妻)。老一輩農民對法律是完全沒概念的，他們只認為收回土地違反做人的基本道理。事實上，陳老一家在此墾耕，生活十分困苦。他女兒說：「我被人笑說：他們夫妻有工作才有得吃，沒工作妳們就要做乞丐了！」陳老貧窮一輩子，沒有自己的土地、沒有法律的觀念，一生心血都投注在太陽谷河谷地，但終究卻歸零。

尤其，隨時代的演變，國土保育的執法愈趨嚴格，因此，這些沒有租約的原墾農民，紛紛陷入土地被收回的厄運中。誠如阿晉得知陳老的土地被收回後，亦深感緊張，「聽說林務局收到田寮了，我們燕巢這邊大家也緊張得要死！萬一突然被收回，非常沒有保障！」但他也深感不平，因為像陳老耕作近五十年，如果不合法，阿晉認為事實上「法律追訴期也過了！」



照片 2 太陽谷河谷開墾情形
(資料來源：2004 年野外考察)

4. 對擁有土地者而言：認為土地經濟效益差

阿雄的土地來自祖先分產及父親購買，「祖先留下來的地就是新養女湖那邊整座山。」父親購買的土地則在烏山頂泥火山附近，當初阿雄父親買這塊地的理由是距離新養女湖較近、地形較平整且價錢較便宜。「這邊的地還算蠻平整的，因為當初我們還住在新養女湖，交通很不方便，走來這邊做事比較近！當時買這边的地很便宜啊！一甲地差不多十萬塊。」阿雄雖然擁有三甲地，但他認為這種土地經濟效益很差，「真是差到沒辦法講！以前整季有收成時，一年下來不超過三十萬，像工廠作業員一個人一年下來可賺個二、三十萬，我們是全家整個收成才這樣子，妳說這有經濟效益嗎？我看會餓死！」阿雄認為泥岩區不具經濟效益的原因在於「第一、一定要有水灌溉嘛！第二、要找工人幫忙！第三、獼猴是個大問題，所有水果它都吃，不管熟或不熟都吃！」阿雄烏山頂的芒果園，這五、六年來都沒有收成。顯然近年獼猴的破壞愈趨嚴重。

綜合上述，在泥岩區的物質世界中務農，可謂「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的生存處境，所謂「天不時」意指水的來源是一大問題，農民必須付出更多的成本，才能有灌溉水源；所謂「地不利」意指土壤貧瘠，且所有權是一大問題；所謂「人不和」意指政府的種種管制措施，使農民深感動則得咎、動則被罰款。

二、可塑世界：農民對自然環境的利用與相關因應策略

(一) 泥岩區務農的理由

在泥岩區生存可謂大不易，然而，何以農民依然在此環境中討生活？

1. 「別無選擇」的選擇

早期農民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墾耕於此，因此後代子孫當然也就必須繼續墾植於此，誠如阿晉認為「雖然這種土地不是非常有價值，但也是爸爸留下來的心血，我們要保護好，不能被沒收走，不能背祖！」守護祖先留下來的土地是後代子孫的權利也是義務；不能被林務局沒收走，更是農民神聖的使命。又如阿惠的兄弟均已離開燕巢到北部工作，所以阿惠自覺必須留下來幫老邁的父親務農，她要結婚時強

調：「我一定不能離開這裡，所以先生就把台北的工作辭掉。」顯然，務農工作必須傳承，除了兒子外，女兒亦可請丈夫一起幫忙娘家务農。這在傳統「重男輕女」、「嫁雞隨雞」的觀念裡，倒是一種突破。

當然，窮人也沒有太多的選擇權，陳老在太陽谷耕作一輩子卻也貧窮一輩子（照片 3），陳妻哀怨道「真可憐！我嫁他真得很可憐！我小時候很少吃番薯簽！來這邊跟他們吃番薯簽！」然而，更不幸的是他在太陽谷的墾地已被林務局收回，地沒了！錢也沒了！生命彷彿風中殘燭。



照片 3 陳老夫妻的住處（說明：陳老的房子被法院查封，只好搬回祖先的百年古厝。屋中堆滿雜物卻沒什麼食物。）

2. 「土地不能荒廢」的信念

土地不能荒廢，對農民而言是天職，也是責無旁貸的事。「要是我們的土地荒廢在那邊，別人就會罵了」（阿晉）。即便務農無法賺錢，但祖先留下來的地就必須繼續守護，「像我收一收也沒賺什麼錢！但祖先留下來的東西，如果我不照顧，人家就會說賺錢了啊！地就荒成這樣不整理，我們鄉下就是很怕人家講話，人家講話你就會有壓力」（阿雄）。所以，雖然阿雄認為這片土地的經濟效益不高，務農也無法賺錢，但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及三姑六婆的閒言壓力，使其整理祖產土地是給親友交代的。

（二）務農與天氣的關係

農業與天氣關係密切，諸如雨天、颱風及溫度均會影響果樹的收成與價格，但農民自有一番因應之道。

1. 雨天對務農的影響

雨天時農民會先去巡田水、把田埂補好，「如果下大雨你不把水潑出去，它會浸

著，如果漲高會把旁邊的埂沖壞，如果補好，整天就沒事了，那就是“天公假”」(阿晉)。此外，由於雨水會把農藥洗掉，所以雨後需噴灑農藥，「像芒果、棗子、芭樂，每下一次雨就要噴一次農藥，因為下雨會把農藥洗掉，病蟲害就來了」(阿雄)。尤其，棗子很怕毛毛雨，因為「現在棗子都是網室，下雨後，網子有髒的地方會滴下來，棗子就會像流眼淚一樣，一條一條的，賣相不好看。所以棗農如果下毛毛雨時，都會一早就去噴水，把它洗乾淨」(阿惠)。顯然雨天時農民仍有許多事要忙，處理完畢後才可放“天公假”。

2. 颱風對務農的影響

颱風天棗農比較累，因為強風時需注意網子是否安好，「要巡一巡，網子要飛走時，有的農民會去拉，風比較大時，人會被帶走。我有個同學曾飛到一樓高又掉下來，已經五、六個人幫忙拉了，還被風拉上去，所以農民也做很多危險的事」(阿晉)。農民冒著生命危險去拉回強風中的網子，實因網子的成本很高，平均一分地「加管子要十六萬元，東西都漲了」(3 全哥)。此外，颱風對農作的影響很大，「像 919 颱風，芭樂會落果，即使不落果也會變成“鹹橄欖”，就是變黑色，所以現在芭樂很貴」(阿惠)。颱風過後，芭樂產量大為減少，所以務農絕對是靠天吃飯。即使颱風過後亦會造成芭樂在下一個產季同時出來，因為「颱風時枝都斷掉了，要修剪，結果會在同一個產季出來，價錢會不好。所以現在要開始調整，把產季錯開來。」顯然，颱風的影響不只在當季，亦會影響下一季的產量，所以農民必須調節產季。

3. 溫度對務農的影響

溫度影響果樹的品質，「天氣熱棗子就會鬆掉、不脆。棗子很怕刮南風，它一下子就會熟成不好吃。棗子愈冷愈好吃」(阿惠)。天氣冷時，棗子長得比較慢，所以比較紮實。棗子多用網室栽培，「因為果蠅很多，如果沒有網室就要用塑膠袋包起來，但包的比較不好，因為表皮會比較脆弱，容易受傷。套袋的比較不甜，因為沒有直接曬太陽、滴露水，從根部吸收的和從外面的不一樣」(阿惠)。溫度對果樹的影響很大，然而芭樂就比較不適合用網室栽培，「因為芭樂需要陽光，用網子陽光就太弱了！但芭樂需要套袋，因為果蠅很會叮，叮到就爛掉！而且套袋它的表皮就不會粗粗的，

比較漂亮」(阿惠)。

綜合上述，農民對天氣的豐富陳述，顯示「靠天吃飯」的農民對天氣的細微變化之感覺與知覺是十分深刻與敏銳的。在「盡人事、聽天命」的可塑世界中，儘管泥岩區的水土資源有限，但農民仍透過改良土壤、築溝蓄水等作為，將荒地化為可栽種之地。農民默默的與大地對話，這些務農的細緻觀察與作為，全賴農民長期的經驗累積。

三、感官世界：農民對泥岩的相關認知

(一) 泥岩命名的依據

「泥岩」一詞，在學術界是普遍的認知，但對於在地農民反而陌生。誠如阿晉沒聽過“泥岩”，但聽過“月世界”及“白崩坪”，「我們這個也類似月世界。“白崩坪”的白是指顏色，崩坪指會崩落。每次下雨後，要是很久沒長草，上面會浮一層白白的。我們這邊有人說是鹽。下雨它就軟軟的，容易流下來」(阿晉)。陳妻稱太陽谷泥岩惡地為“溪仔地”(台語)，因為「那邊有一條溝啊！」這是老人家較為直接的環境意象命名。阿惠稱泥岩為“泥炭土”，這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稱呼，阿惠沒有多作解釋，只說他們都這樣稱呼。顯然此一命名是張冠李戴了，但就人們生活經驗而言，泥炭土是園藝栽培廣泛使用的介質之一，乾燥時易形成硬塊，水份不易吸入，此特點和泥岩雷同。這些命名或許不盡正確，但可顯示農民對泥岩環境認知的成果與表達的符號。

(二) 泥漿與皮膚的關係

在地農民對泥漿與皮膚關係的理解是「沒試過，不知道！以前聽過養女湖、泥火山的土可治皮膚病。我曾拿狗去試驗，真的有效。狗比較容易得皮膚病，整隻給它抹一抹曬太陽，一次就好了」(阿晉)。顯然，拿動物試驗的風險比人類低，然而，泥漿對人類皮膚的功效如何？「有聽很多人在講，但實際很少人在用，都是外地人在用。以前有人挖來賣，用寶特瓶裝，一罐 50 元」(阿晉)。源源不絕的泥漿被人商品化，但在在地人倒是不敢嘗試。

(三) 泥岩與植物根系的關係

農民爲了利用泥岩區，必須觀察入微，甚至連植物根系的生長情形都必需和地形配合。阿雄在烏山頂種芒果、在新養女湖種龍眼，他的理由是「金煌、棗子這類東西根往旁邊生，不會直接伸到泥漿，所以可種在烏山頂的平地。但龍眼是往下紮根，它的根伸進去就會吃到泥漿，而新養女湖是山坡地，所以可以種。」顯然如何在泥岩區種植果樹，農民自有一套細微的觀察與因地制宜的措施。此外，阿雄也曾「在烏山頂種田，我小時候就種過田，稻子的根很淺，可能不到一尺。」所以烏山頂這邊大概有五、六尺的表土不是泥岩，阿雄稱爲「“瘦地”(台語)，就是沒養分的地。之前我們種稻，一甲地才收成三、四千斤，一般平原大概收六、七千斤」由此可知泥岩區農民生計的艱難。

伍、農民的環境識覺形構

透過上述農民生活世界的主題揭示，進一步可深入探究在現象背後的环境識覺內涵與形構意義。因爲，我們在環境中生活的方式，也正是在環境中識覺的方式。在地理學中，這導向了對於構成生活世界的地方具有主觀性的探究，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在於它得以構成現象的脈絡性意義以及表示出個體的意向性能力。誠如 Ingold (1996) 所言：「理解世界不是去建構 (construction) 而是設身處地的參與 (engagement)；不是去建築 (building) 而是去棲居 (dwelling)；不是去創造一個世界觀點而是透過涉入世界產生觀點」。據此，欲理解人類如何識覺、感知他們的周圍環境，各學科或有不同的角度切入，但整體的生活方式才是環境識覺的基礎。換言之，農民環境識覺的形構，基本上脫離不了日常生活的處境，處境是做爲生活世界的知識條件，人在處境中溝通、察看，進而構成行事形式與態度，因此，人的識覺與日常生活處境的種種可說是互爲因果的關係。

具體說明如圖 4 所示，圖中左半側說明泥岩區農民的环境識覺形構實根源於每一主體存在的基本形式，誠如土農工商各行各業，各有不同的存在形式；讀書人認真做學問、農人認真種田本是截然不同的生存處境，自然地對世界的認知也會各有見解，所以「我存在、我覺知、我創造」是識覺形構的本質。此外，不能忽略農民

的時間感變化，傳統農民生活以“代”作為主要的時間維度，代代相傳中最重要儀式是“分家產”，透過家產的一代傳一代，傳統的時間框架因而構成。誠如阿晉的父親生前便將財產分配好，對阿晉而言，家產必須代代相傳，否則就背祖了！代代相傳也是農村生活的基本節奏，更細緻的區分，一天、一季、一年或一代，所有這些時間單位在本質上是“循環的”，農民年復一年有節奏的進行田間實作，恰如植物的生產週期及相關農事活動。然而，新經濟活動的引進農村，使時間出現線性的現象。即後代可能不再完全重複父執輩在同一時期所做的事情，例如阿晉經營鐵工廠生意，並與務農活動穿插安排；阿雄雇人整理果園，自己則經營土雞城生意；阿惠與先生各自維持一份固定的工作，務農活動則是利用上班前及下班後進行。線性時間觀使農民的生活步調更為多元。

圖中右半側則具體說明泥岩區農民的環境識覺形構與意義內涵，基本上可分為三大影響因素，即家族因素、社會因素及自然因素，詳述如下：

一、家族因素：土地繼承制是孕育生活環境識覺的基礎

（一）生活就是認知活動的學習與實踐

土地繼承制彷彿一張無形的網，將後代子孫維繫在務農活動的相關知識與經驗中。誠如阿晉小學六年級時，就三更半夜和爸爸去丘陵陡坡中採竹筍，剛開始常滑倒，後來就知道如何走陡坡才安全。農家子弟從小透過這樣的環境訓練，使他們對於山中環境有深刻的體驗。這些微小的變化，必須透過農民經年累月的勞動和觀察，方能瞭解更多的細節。因此，農民對土地的照顧總有自家獨特的作法與想像，例如：阿惠家族將田埂鋪上地毯以防止雜草叢生；將一箱箱過期的沖泡式麥片或玉米濃湯粉作為肥料；阿哲將木炭加在土壤裡，認為種出來的芭樂特別好吃；鄉長將貝類的殼磨成細粉施肥，以增加植物枝幹的抗颱風能力等。農民訴說著自己的「秘方」，在改良土壤與植物品質方面，展現人的能動性。至於成功與否，則是一連串的實驗與體驗的過程。

(二) 生活經驗影響人生觀

太陽谷陳老家族的百年古厝可說明家族落地生根的互久影響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陳家後代子孫只能依靠惡地有限的物質條件生活，封閉的山居歲月，造就陳老一家貧苦生活的寫照，而貧苦生活經驗影響著他們的人生觀。陳老的女兒強調從懂事以後就幾乎沒有吃到白米，番薯簽是她貧窮記憶的代表性主食。貧窮帶給陳老女兒自卑、迷信的心態，從小就被人取笑會當乞丐，使其膽小怕生，對於貧苦的一生，只能認為是命中注定。陳老的妻子認為嫁給陳老真是可憐，「就是做生做死啦！」她的語氣充滿抱怨，但也只能認命地和土地相依為命。「農民」對於老農彷彿是一種存在的方式，而不是一種職業。他們生來就是農民，並且一直是農民，務農與自己是“同生同滅”的。

(三) 別無選擇的務農者

在農村的後代子孫當中，必須有人成為務農者是別無選擇的宿命。例如阿惠家中的男丁均已在北部工作，因此她意識到自己不能離開燕巢，於是要求丈夫留在自己的故鄉。又如阿雄家族世居新養女湖附近，知名景點新養女湖就是家族的私有土地。阿雄經營土雞城生意使其不必依賴傳統的務農活動謀生³，但他仍得雇人照顧祖先留下來的土地，以避免親友給予閒言閒語的壓力。因此，對阿雄而言，務農活動即便沒有賺錢，仍得維持有人管理土地的形式。

(四) 土地感：有土斯有財

土地對農民而言，除了祖傳情感的聯繫外，傳統的農業經濟使農民認為土地是重要的資本與唯一可靠的財富。誠如阿惠的父親，雖然家中男丁已離農到北部就業，但他存下來的錢依然會買農地，就老農的認知，土地愈多愈好。但阿惠卻認為有錢買房子可以出租，不必像務農這麼辛苦就可以收到租金。顯然，傳統老農的認知背景在於早期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中，農業生產是為了養活家中眾多的人口，只有剩

³ 阿雄家族的土地位於新養女湖及烏山頂泥火山附近，因為觀光景點帶來人潮，所以阿雄得以經營土雞城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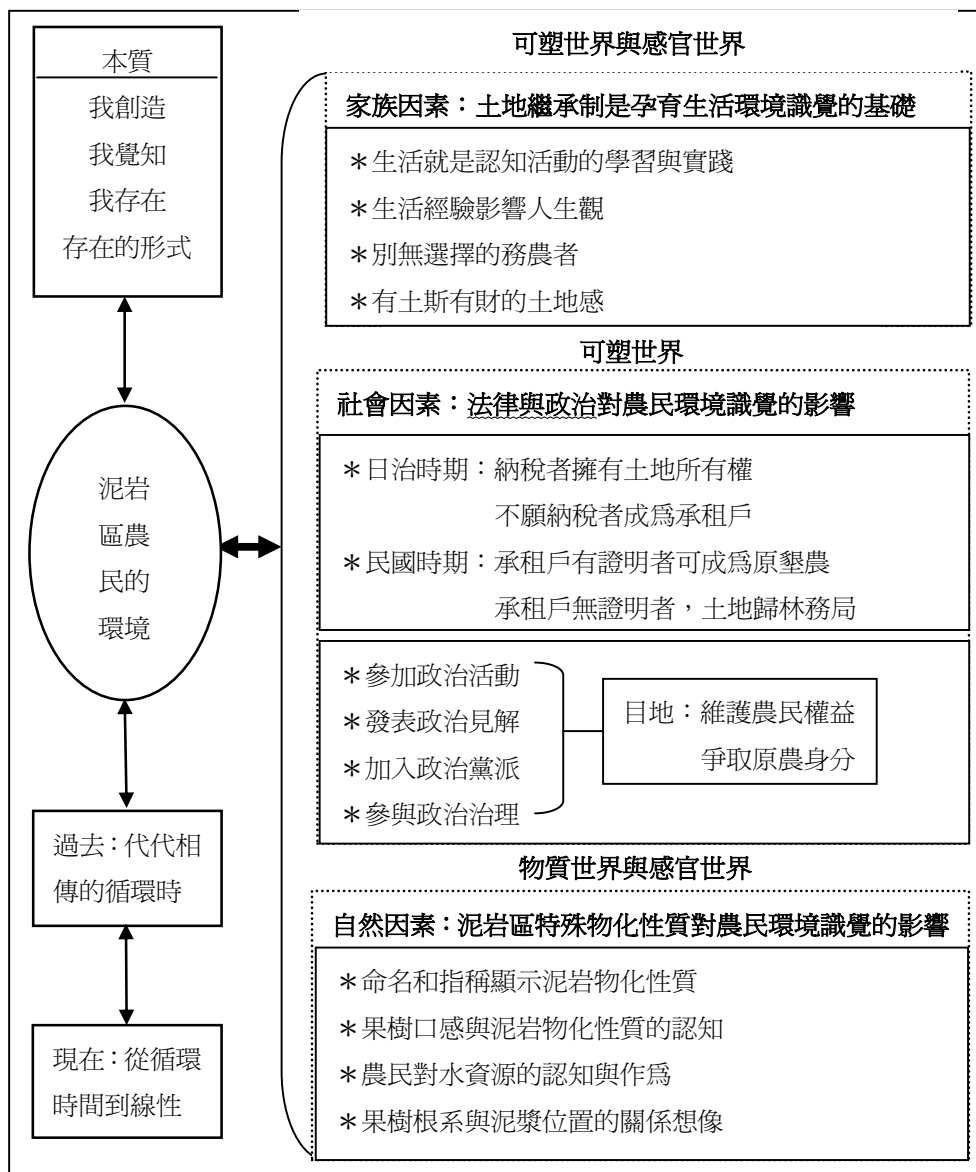


圖 4 農民的环境識覺形構與意義內涵

說明：圖中虛線代表物質世界、可塑世界與感官世界其實是可互相涵括與滲透的，分類只是為了方便說明；實線則代表一般表格的概念。此外，圖 4 相較於圖 2，圖 4 是圖 2 中「識覺形構的本質：我存在、我覺知、我創造」等抽象概念的具體落實與統整論述。

餘的產品才會賣掉。因此，土地除了可養活代代的人口外，還可創造收入。雖然農業收入有限，但擁有土地才能確保自己永遠的基本生存。

二、社會因素：法律與政治對農民環境識覺的影響

(一) 法律與土地所有權的關係

農民與土地的關係密切，解讀農民的生存樣態必須理解土地所有權的變化。台灣的土地制度變遷，歷經荷蘭時期的「王田制」、明鄭時期的「官田制」到清朝時期的「墾佃制度」。其中，「官田制」是台灣土地私有制的開始。日治時期，台灣地租規定「田賦依照舊慣收納」，沒錢納稅者則喪失土地所有權（林英彥，2010）。因此，隨著物換星移，原墾農很可能在時空變遷中喪失土地所有權而不自知。尤其，目前國土保育的執法愈趨嚴格，因此，這些早期在泥岩區原墾卻沒有租約的農民，紛紛陷入土地被收回的厄運中。

(二) 政治活動與農民權益的保障關係

在政治活動與農民權益的保障關係中，泥岩區農民參與政治活動的主要目的在於維護農民的權益，爭取原墾農的身分保障。阿晉曾背負一大袋的陳情書、申請書及聯署書到立法院陳情，但結果卻只有四個字「依法辦理」。近來由於2012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關於此一議題似乎稍有轉圜空間。根據黃珧琮（2011）於【在地情報】的報導顯示，農委會願意從簡政便民的角度思考，同意加速辦理續約處理原則，此結果算是暫時解決農民換租約單時被刁難的種種頭痛問題。雖然並未真正解決土地原租問題，但對農民而言，陳情總是有了初步的成果。

三、自然因素：泥岩區特殊物化性質對農民環境識覺的影響

(一) 命名和指稱與泥岩物化性質的關係

農民對泥岩物化性質的了解，可由其命名與指稱（reference）而略知一二。「指稱」是一個含意的「參考依據」，指稱代表了語言和世界的關係，哲學家認為語詞

始終牢牢地連繫著指稱的對象 (陳瑞麟, 2003)。農民透過對泥岩命名的指稱, 可顯示其對泥岩認知的特徵結果與表達的符號。命名過程貫穿著農民的思維活動, 並顯示他們對此一語詞的掌握和創造經過。然而, 農民對泥岩命名的語詞所反映的概念, 並非絕對科學地說明客觀事物的真正本質, 只是民間對泥岩所捕捉到的諸多認知與情意元素的命名轉化結果, 透過命名和指稱, 農民對泥岩物化性質的識覺因而被揭露。

(二) 果樹口感與泥岩物化性質的認知

農民對泥岩區果樹擁有特殊口感具普遍共識。例如他們認為「那種土種出來的棗子、芭樂特別好吃」「只要吃過就會被迷住」「燕巢芭樂有種酸酸甜甜的味道」等概念。阿惠以月世界做比較, 認為月世界的鹽分較重, 所以只能長赤竹筍, 而月世界的水流到燕巢後, 鹽水已稀釋了, 所以燕巢可種出風味特別的果樹。顯然, 農民對環境的觀察自有一套看法。事實上, 根據高雄畫刊 (2011) 的網頁顯示, 燕巢經泥火山岩漿土壤沖積形成, 土壤經土質測定分析, 發現所含的鈣、磷、鎂及許多微量元素含量偏高, 所以造就果樹的特殊口感。

至於「農民對水資源的認知與作為」和「果樹根系與泥漿位置的關係想像」兩項意義內涵, 已於前述, 在此不贅述。

總結上述, 農民對泥岩區的環境識覺形構, 除受家族、社會及自然等因素影響外, 事實上, 每個農民由於個人年齡、教育程度、價值體系、社會閱歷與知識面的不同, 亦會產生不同的環境認知。諸如老一輩的農夫, 對於法律的變遷渾然不知; 較年輕的農夫則知道利用相關管道, 盡力爭取自己的權益; 知識程度較高者, 則懂得不斷研究改良農產品; 知識程度較低者, 則傾向謹守自己的經驗, 只相信自己的務農秘方等不一而足。然而, 這些影響因素並非獨立的影響因子, 以條列的方式呈現只是為了方便聚焦說明, 其實生活是整體感覺、知覺與經驗的實踐, 是一種關聯式的結構。人如何識覺幾乎和人的成長記錄及環境關係密切, 我們無法追溯過去, 但可從當下整體受訪者的語言呈現, 分析生活世界中所陶鑄的個人及其識覺。因此, 環境識覺的形構彷彿拼圖過程, 日常生活的人、事、物與境均構成拼貼的一部分, 由模糊漸趨清晰。在漸趨清晰中, 可見每一主體的存在、覺知與創造性。在看似平

靜傳統的泥岩區人地互動場域中，實隱含外人不易察覺的區域性環境識覺特色。因此，環境識覺研究最大的意義就在於藉由主體性的視角，使我們對於每一個不同的「他者」因此多了一份理解與關注。如此，當我們再次聽到「農民很可憐」或「農民很辛苦」的說法時，才不會因缺乏同理心而麻木地覺得那已是公式化的形容，一句話的背後其實隱含更多農民的血淚生活史。

陸、結論與後續研究

本研究在現象學理論對於主體意識的強調下，使泥岩區農民的生活世界被如此這般的開展出來。生活經驗的本質結構不僅指示了環境識覺重要的組成元素，也涵蓋了這些元素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簡言之，本文探討回應三個研究目的作為具體研究成果，並提出後續的研究議題作為總結。

一、具體研究成果

(一)環境識覺研究之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建構

本文透過胡塞爾和海德格的現象論體系，建構了環境識覺研究的知識論基礎與方法論根基。現象學與環境識覺研究的契合處在於兩者均關注人類意識世界與主體性的問題。然而，事實上現象學方法的應用，在台灣環境識覺的相關研究中尚不普及。誠如Seamon (2000) 認為，現象學在環境行為方面的研究，過去十年已有進展，但這條路徑在許多主流的研究者中仍是「模糊的」；陶建文 (2000) 亦認為中國對於人文地理學中的現象學方法論述很少，偶有提及也只是三言兩語，更談不上有意識地運用。因此，本文回應研究目的之一，在於以現象學作為經驗科學的基本立論基礎，提出了一套在環境識覺研究中可具體操作的方法，藉此我們得以深刻理解泥岩區農民的生活世界，及由此形構出來的環境識覺與意義內涵。

(二)泥岩區農民的生活世界建構

現象學的「生活世界」理論，基本上是傾向於一種場域性的世界理解；即我們的視域受到我們所處的生活世界所導引。因此，日常生活經驗是形構環境識覺的泉

源與基礎。本文回應研究目的之二，透過交談分析法的不斷拆解與重組，建構了泥岩區農民的生活世界圖像：在「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的物質世界中，農民深受自然環境與政府管制作為的影響；在「盡人事、聽天命」的可塑世界中，農民化荒蕪為良田，在貧瘠土地中求生存，進而代代相傳；在感官世界中，農民對地形的「命名」，說明了他們對視覺、感覺及想像等感官經驗的運用。

(三) 揭示泥岩區農民環境識覺的意義內涵及其形構

透過農民生活世界由混沌到逐漸清晰，意謂農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及所感所知也逐漸被揭示。因此，在現象學地理學視角下所呈現的環境識覺研究，是以受訪者為主體來揭示整個研究過程，透過每一個當事人的視域來理解世界。據此，在呈現受訪者由日常生活觀點所進行的主體陳述之後，本文進一步整併泥岩區農民的環境識覺形構之統整論述。在家族因素中，農民深受土地繼承制的影響，它是孕育生活環境識覺的根本基礎；在社會因素中，法律與政治深深影響著農民的感覺與知覺，在訪談的個案中，農民幾乎或多或少的提及對政策法令的約束與不滿，凸顯泥岩區農民環境識覺中最大的特色就在於與政策法令息息相關；在自然因素中，泥岩區特殊的物化性質啓發農民的認知、想像與作為。據此可知，環境識覺的形構，基本上脫離不了存在的形式，農民在生活世界中的點點滴滴互動，看似瑣碎，其實正是形構環境識覺的源頭活水，只因我們太習以為常，以致常常忽略了它們的存在及深刻的影響力。

簡而言之，泥岩區「人－地關係」的探討在地理學領域中是貧乏的，本文從現象學的理論與方法，揭示了泥岩區農民的生活世界及由此產生的環境識覺形構內涵。因此，本研究對於增添泥岩區「人－地關係」及主體性的環境識覺研究，提供了具參考價值的貢獻！

二、後續研究議題

本文透過現象學的理解，探討泥岩區農民的環境識覺。然而，「理解」未必代表「認同」，但透過理解方能對話。因此，本研究只是忠實地呈現農民主體性的視角，

未必代表農民的所言所行就是對的，或者政府對於泥岩區的作為就是錯的。事實上，現象學「存而不論」的精神，就在於對研究議題「如其所是」的呈現出來，而非追究誰對誰錯的問題，職是之故，如果今天的受訪者為林務局的專員，則想必會因處境不同而有一番不同的環境識覺，因此，相關研究對象的訪談是後續值得研究的議題之一。

此外，透過文本資料步驟化的分析，事實上並非只有一個模式，本研究只是提供了一個具體可討論的參考模式。在此，我們必須強調的是現象學地理學方法的核心，並非要大家依循固定的模式操作，換言之，我們不能將理解現象學作為只是一種分析的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現象學的態度與精神，必須融入每一個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中，以此洞察習以為常的人情世事。因此，現象學地理學的方法儘管在環境識覺的應用方面仍不成熟，且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與困難，但仍值得後續繼續努力研究。

最後，本研究發覺以現象學地理學方法探究人地關係時，研究區域及研究對象無法太大與太多，否則文本資料會十分龐雜而難以聚焦。誠如本研究在訪談前曾野外實察左鎮、龍崎、內門、田寮、旗山與燕巢等地的泥岩區，然而，實施農民訪談後，僅田寮、燕巢兩區 14 名受訪者的訪談文字稿就高達 15 萬 5 千餘字，所以，本研究必須先分析這些訪談文字稿所呈現的共同性及差異性主題，而無法再擴及其它地區。換言之，臺灣西南部泥岩區尚有許多其他地區的農民，他們的環境識覺和本研究是否有區域性的識覺差異，實值得後續一探究竟。

柒、引用文獻

于濤方、顧朝林 (2000)。人文主義地理學—當代西方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流派。

地理學與國土研究, 16(2): 68-74。

王洪文 (1988)。**地理思想**。台北：明文。

任家弘 (1994)。**泥岩邊坡沖蝕特性之研究：以不同風化程度之泥岩邊坡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宋國城、陳力 (2006)。從地形系統觀點探討泥火山地景的敏感性。**地理學報**, 44:

39-53。

池永歆 (2007)。現象學、經驗科學與地理學：奠基於生活世界理論的地理學。台中：紅豆。

李天命 (1976)。存在主義概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李德河、林宏明、楊沂恩 (2002)。泥岩邊坡之穩定處理。地工技術，94: 41-52。

李維倫 (2004)。以置身所在做為心理學研究的目標現象及其相關之方法論。應用心理研究，22: 157-200。

李燕蕙 (2005)。早期海德格的生死哲學。揭諦，8: 93-134。

吳唐竹 (2004)。烏山頂泥火山噴發活動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吳豐維 (2007)。何謂主體性？一個實踐哲學的考察。思想，4: 63-78。

汪文聖 (2001)。現象學方法與理論之反思：一個質性方法之介紹。應用心理研究，12: 49-76。

林英彥 (2010)。台灣土地制度之變遷。土地問題研究季刊，9(4): 124-136。

林慧宜 (2006)。二仁溪中上游泥岩區河道演育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若林芳樹 (1985)。行動地理学の現状と問題点。人文地理，37(2): 148-166。

倪梁康 (2005)。現象學及其效應：胡賽爾與當代德國哲學。北京：三聯。

倪進誠 (2004)。參與觀察法在旅遊行為研究上的應用~一個貼近人地互動的思考設計。社會科教育學報，7: 53-87。

施添福 (1980)。地理學中的人地傳統及其主要的研究主題。師大地理研究報告，6: 203-242。

袁方編 (2002)。社會研究法。台北：五南。

高宣揚 (1993)。存在主義。台北：遠流。

高淑清 (2001)。在美華人留學生太太的生活世界：詮釋與反思。本土心理學研究，225-285。

高雄畫刊 (2011)。城市風情—高雄物產在地好禮。
http://epublication.kcg.gov.tw/pictorial_short_content.asp?EPkey=5017。

- 許淑娟 (1991)。蘭陽平原祭祀圈的空間組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陳力 (2005)。旗山斷層沿線泥火山產狀與噴發活動的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陳盟文 (2006)。土胎植生工法於泥岩護坡成效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
- 陳瑞麟 (2003)。科學概念的指稱與投射。歐美研究，33(1): 125-192。
- 陶建文 (2000)。論現象學方法對人文地理學研究的影響。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17(2): 64-66。
- 張文章、阮亞興 (2003)。惡地創生機—泥岩裸露邊坡之護坡工程。泥岩自然生態工法研討會論文集，161-170。
- 張毓棻 (2008)。日本時期台灣西南部泥岩地區經濟活動的重建—以高雄縣燕巢地區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葉宛錡 (2001)。阿蓮區域社會空間結構的變遷。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楊智傑 (2008)。台灣西南部泥岩丘陵之土地退化分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鄔昆如 (1990)。哲學概論。台北：五南。
- 董金進、阮亞興 (2003)。惡地創新機—泥岩地區之自然生態工法。泥岩自然生態工法研討會論文集，117-127。
- 潘朝陽 (1991)。現象地理學—存在空間的一個詮釋。中國地理學會會刊，19: 71-90。
- 潘朝陽 (2001)。出離與歸返：淨土空間論。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印行。
- 潘朝陽 (2005)。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台北：五南。
- 蔡錚雲 (2006)。現象學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 (第二部分)：實徵與詮釋兩種應用模式系譜上的對照。應用心理研究，29: 53-70。
- 鄧曉芒 (2008)。哲學史方法論十四講。重慶：重慶大學出版。

- 聶英潔 (2006)。以地形圖分析臺灣西南部泥岩區河流地形之變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魏光莒 (2006)。「生活世界」—由「視域」理論到「場域」。《環境與藝術期刊》，4: 17-23。
- 韓菊美、宋國城 (2003)。高雄市大坪頂梁姓血緣聚落的形成與空間發展。《環境與世界》，7: 91-120。
- 韓菊美、吳連賞、宋國城 (2011)。現象學地理學視角下的環境識覺研究—以燕巢泥岩區為例。《環境與世界》，23: 19-48。
- 鐘寶珍 (1991)。惡地上的人與地--田寮鄉民生活方式的形成與內涵。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黃昭琮 (2011)。承租國有林地案 將訂定租地換約等便民措施。《在地情報》，取自 <http://www.nownews.com/2011/10/17/11464-2749968.htm>。
- Amedeo, D. M. et al. (2004).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nd Behavioral Geography*. Gaile G L, et al. *Geography in America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3-148.
- Aplin, A. C., Fleet, A. J. & Macquaker, J. H. S. (1999). Muds and Mudstones: Physical and Fluid-Flow Properties.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Special Publications*, 158: 1-8.
- Bunting, T. E. and Guelke, L. (1979). Behavioral and Perception Geography: A Critical Appraisal. *A.A.A.G.*, 69(3): 448-462.
- Churchill, S. D., Lowery, J. E., McNally, O., and Rao, A. (1998). The Question of Reliability in Interpretiv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R. Valle (Ed.),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in psychology* (pp. 63-85). New York: Plenum.
- Crystal, D. (2001)。《語言的死亡》(周蔚譯)。台北：貓頭鷹。
- Downs, R. M. (1970). Geographic Space Perception: Past Approache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C. Board et al. (ed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 (pp. 65-108). London: Edward Arnold.
- Droit, R. P. (2007)。《沙發上的哲學對話》(于光雅譯)。台北：麥田。

- Giorgi, A. (1997). The Theory,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cedure. *Journal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28(2): 235-260.
- Gold, J.R. (1980).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Ge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egory, D. (1978). *Ideology, 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 London: Hutchinson.
- Hay, Alan M. (1979). Positivism in Human Geography: Response to Critics. In Johnston, R.J. and Hebert, D.T. (eds), *Geography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 Progress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pp.1-26). New York: Wiley.
- Heidegger, M. (1990)。存在與時間 (王慶節、陳嘉映譯)。台北：桂冠。
- Hobbs, P. R. N., et al. (2002). *Engineering geology of British rocks and soils — Mudstones of the Mercia Mudstone Group*. 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Research Report.
- Husserl, E. (1992)。歐洲科學危機和超越現象學 (張慶熊譯)。台北：桂冠。
- Husserl, E. (1999a)。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 (倪梁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Husserl, E. (1999b)。邏輯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 (倪梁康譯)。台北：時報。
- Ingold, T.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i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 Ley, D. (1982). *Rediscovering Man's Place, Contemporary Geographical Thought — A reader*.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 Moran, D. (2005)。現象學導論 (蔡錚雲譯)。台北：桂冠。
- Palmer R.E. (1992)。詮釋學 (嚴平譯)。台北：桂冠。
- Polkinghorne, D. (1983). *Methodolog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SUNY Press.
- Peet, R. (1998).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Rodaway, P. (1994). *Sensuous Geographies: Body, Sense and Pla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ubin, A. & Babbie, E. (2000)。研究方法：社會工作暨人文科學領域的應用 (趙碧華、朱美珍合譯)。台北：學富文化。

- Saarinen, T.F. (1974).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In Manners, I.R. and M.W. Mikesell eds.,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 (pp.252-289). Commission on College Geography, Publication No.13.
- Schieber, J., Southard, J. & Thaisen, K. (2007). Accretion of Mudstone Beds from Migrating Floccule Ripples, *Science* 14, Vol. 318, 1760-1763.
- Seamon, D. (2000). A Way of Seeing People and Place: Phenomenology in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In S. Wapner, J. Demick, T. Yamamoto, and H Minami (Ed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pp. 157-178). New York: Plenum.
- Sonnenfield, J. (1968). Geography, Perception, and the Behavioral Environment. In English, P.W. and R.C. Mayfield, eds., *Man, Space, and Environment* (pp. 244-251).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 Taylor A. (2003). *Weathering and hydrological processes on shore platform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
- Taylor S.J. & Bogdan R. (1984).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econd Edition, London: Wilsy.
- von Eckartsberg, R. (1998). Existential-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In R. Valle (Ed.),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in psychology: Existential and 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pp. 21-61). New York: Plenum Press.